

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探研

黄日初◎著

齊魯書社

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探研

黄日初◎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探研/黄日初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4

ISBN 978-7-5333-3333-1

I. ①唐… II. ①黄…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4900号

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探研

黄日初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86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333-1

定 价 45.00元

本书由四川大学博士后研究经费资助

目 录

第一篇 引 论 /1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1
- 二 相关概念之界定 /3
- 三 问题之提出 /7
- 四 学术研究概要 /9
- 五 考察视角与研究方法 /15

第二篇 晚唐中枢政局变动的起点

——以唐文宗的继位为考察对象 /17

- 一 文宗以前中枢政局演变的基本特征 /17
 - (一) 关于皇位继承的回顾 /17
 - (二) 关于政治中枢的发展变化 /30
- 二 由“宝历宫变”所引发的继统困局 /49
 - (一) 从几则热点史料谈起 /49

- (二) “宝历宫变”与文宗继统：兼论宗室亲王政治地位的转变 /56
- (三) 政治中枢各派势力在文宗继位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62
- 三 宝历、大和之交的中枢政局及其意义 /69
 - (一) 内廷宦官集团首次以独立势力的姿态介入皇位继承 /69
 - (二) 政治中枢弹性制衡机制基本定型 /72
 - (三) 新皇位继承方式肇端及皇位继承制度之形变 /75

第三篇 唐文宗大和年间的中枢政局

——以中枢各政治派别的矛盾斗争为考察对象 /78

- 一 大和年间唐朝中枢政局内几类政治斗争述略 /79
 - (一) 外朝的党争：兼论牛李党争之始因 /80
 - (二) 宦官的内争：兼论“牛李党争从属于阉寺内争” /88
 - (三) 从刘蕡到宋申锡：论内廷与外朝的矛盾兼论所谓“南衙北司之争” /91
 - (四) 政治体制视角下的大和年间中枢政局 /95
- 二 大和末年中枢政局的失衡与中枢体制的内廷化 /98
 - (一) 李训与郑注的崛起：政治中枢制衡体制的内廷化 /98
 - (二) 文宗何以倚重翰林学士势力 /107

第四篇 “甘露之变”与中枢“内外共议”体制的初步形成 /111

- 一 关于“甘露之变”的探讨 /111

- (一) “甘露之变”的谋划与实施：兼论李训、郑注的矛盾分歧 /111
- (二) 从中枢体制内部权力再分配的角度探讨“甘露之变”的性质 /116
- (三) 从中枢体制权力配置失衡的层面反思“甘露之变”的败因 /124
- (四) 李训抢先发动政变之深层原因试探 /127
- (五) 试析唐文宗与“甘露之变”的关系问题 /134
- 二 “甘露之变”后政治中枢权力配置的变化及其后果 /142
 - (一) 政治中枢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 /143
 - (二) 中枢“内外共议”体制的初步形成 /150
 - (三) 地方藩镇首次直接介入中枢政局的权力斗争 /155
- 三 中枢“内外共议”体制下的开成政局 /159
 - (一) 文宗为维护皇权所采取的措施 /160
 - (二) 外朝官僚稳定政局之努力：兼论其取得成效的原因 /172
 - (三) 党争之收敛与复起：兼论开成党争的特点 /180

第五篇 开成末年的中枢政局

——以中枢各政治派别围绕储位问题的斗争为考察中心 /190

- 一 开成末年的储位问题及其引发的政治斗争 /191
 - (一) 文宗首次立储及议废太子风波 /191
 - (二) 文宗再次立储及其遗留问题 /198
 - (三) 文宗二度择储的人选问题与开成政局 /208

- (四) 文宗托孤之举与神策中尉干涉储君人选 /215
- (五) 神策中尉对文宗两任储君厚此薄彼之考索 /224
- (六) 武宗之立与枢密使的未遂政变 /229
- 二 开成、会昌之交的中枢政局及其意义 /238
 - (一) 政治中枢“内外共议”体制的短期异化与最终确立 /239
 - (二) 新皇位继统方式最终形成与宦官策立嗣君制之确立 /242

第六篇 唐武宗会昌年间的中枢政局

——以皇权对中枢体制权力配置的再调整为考察中心 /247

- 一 武宗朝中枢政治的“复式二元格局” /247
 - (一) 复式二元格局的形成：对中枢“内外共议”体制异化之反动 /247
 - (二) 复式二元格局的内涵 /262
 - (三) 复式二元格局下的武宗朝政治 /278
 - (四) 复式二元格局的暂止 /304
- 二 以武宗朝中枢政局的角度看“会昌伐叛”事件 /311
 - (一) “甘露之变”的余波：消除地方强藩介入中枢政局的影响 /312
 - (二) 限制宦官监军的权力与相权政治的形成 /322
 - (三) 党争与废佛的特殊场所 /332
- 三 复式二元格局下的皇权重振 /336
 - (一) 君主出令权之强化 /337

(二) 确立“不正储位”之制：中唐以来“不立皇后”之制的极端化 /343

(三) 设置备边库与皇权强化之关系 /353

第七篇 结束语 /360

一 对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的总结与思考 /361

二 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治体制之演进及其意义 /363

三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文宗武宗两朝献替 /367

参考文献要目 /372

出版补记 /397

第一篇 引 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本书以唐朝的中枢政局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中枢政治制度之变革的角度来考察处于中晚唐之交的唐文宗、唐武宗两朝的中枢政局及其演变过程，属于政治史的研究范畴。之所以要选定这样一个考察对象，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唐朝的国家中枢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是从中唐政治体制向晚唐政治体制转变的过渡阶段。就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人事变动和体制变迁而论，莫不如此。

如果我们把古代传统社会中的权力系统看作一组同心圆，则皇权政治恰好就处于圆心的位置上，而不同层次、不同级别

的权力系统与政治集团则分布在这一系列的圆周上，并经常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这组同心圆中最里边的一圈就是（政治）中枢，它也是这一权力系统的核心，因而它的重要性、作用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其他任何权力因素所难以相提并论的。特别是对于统治阶级的上层而言，更是如此。

既然这一权力系统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下，则意味着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中枢政治体制，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形之下会呈现出不同的矛盾及其相应的状态，因而其面貌也显得千差万别。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权政治就是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即所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这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皇权政治的运作因为受到士族门阀势力的削弱而一度堕入低谷的情形，故此时皇权的行使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形变。田余庆先生则把这种受“门阀政治”影响下的皇权政治概括为“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①。而此后的隋唐以及宋朝，整个社会和政治形态在前一历史时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所谓“唐宋变革”。从总体上来说，士族门阀势力在隋唐时代逐渐淡出权力核心，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科举之兴起为契机而进入中枢统治层的庶族地主乃至普通士民，并在此基础上向着新的官僚政治形态过渡。在此过程中，皇权之各种可能的对立面逐步被消弭和清除，皇权政治中的君主个人专制权力也得以大大加强，特别是皇权政治的统治机构也随之不断成熟与完善，整个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也因此发生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360页。

了内在的深刻变化。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唐代的中枢政局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当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基本面貌，而且各具特色，同时由此构成了唐代一系列政治事件的体制背景。

但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一般只围绕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具体历史事件以及相关历史人物进行探讨，这样的好处是容易做到细致和深入，几乎可以面面俱到，但不容易找出中枢政局的变迁轨迹。然而，实际上，中枢政局必须是在具体政治运作的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的，因而其真实的存在状态也是处于不断地调整、变更与演化过程之中的。此外，国家权力中枢尽管相对于其他权力因素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但也绝不是毫无顾忌且能够随心所欲的。恰恰相反，中枢的任何活动与行为，都必须受到特定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社会状况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自然也要遵循着一定的规范与法则。只不过，由于中枢处于国家权力系统的核心位置，对所处的政治体制产生的影响与冲击往往会比其他权力因素要更大、更深一些，有些猛烈的冲击甚至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某些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约束和限制。所以，采取辩证的眼光对中枢政局进行相关的研究，也就有了深刻和现实的龟鉴意义。

二 相关概念之界定

本书的考察对象主要是唐文宗、唐武宗时期的中枢政局。

所谓的“中枢政局”，是指在君主专制社会中的皇权政治在运行中的具体形态，包括以皇权为中心的、服务并服从于皇

权的权力系统与利益集团所处的某种状态，以及这种状态的演进情形。^①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形式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皇帝权力（君权）是国家政治的最高权力。^②因而所谓的“皇权政治”，指的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皇权的运作情况直接反映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内容和面貌”^③。

就研究的时段而言，唐文宗、唐武宗两朝属于唐代后期的重要阶段，确切一点来说，是处于中唐向晚唐演变过渡时期。由于书中涉及一些与唐史分期有关的诸如“唐代后期”“中唐”以及“晚唐”等用词，下面稍作解说。目前唐史学界对于唐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大致有三种看法，即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

二分法，是把唐代历史分成两个时期，即唐代前期与唐代后期，两者一般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点〔也有人定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颁布〕，原因在于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在此以前，唐朝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其鼎盛时期。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逐渐形成半自治状态，北方

① 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② 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③ 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纷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也认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这是唐代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在学术界已经成为普遍的看法。

三分法，则以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的说法为代表。其中前期是唐高祖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618—741）；中期自玄宗天宝元年至宪宗元和十五年（742—820）；后期自穆宗长庆元年 至哀帝天祐四年（821—907）。其划分法是以“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为依据。前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强盛状态”。中期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后期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这种划分对于分析唐代政治史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史也有一定便利之处。

四分法，则是把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初唐—高祖至睿宗；盛唐—玄宗至肃宗；中唐—代宗至文宗；晚唐—武宗至哀帝。四分法最初应用于唐代文学史（特别是唐诗

^① 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史研究)之中,由于这一分法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和适应性,因此被广泛移植到文学以外的唐史其他研究领域。^①

就本书而言,如果不作特别说明,则以上述的二分法为基础,唐(朝)前期和唐(朝)后期即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前期相当于四分法中的初唐、盛唐两个时期;唐(朝)后期相当于四分法中的中唐、晚唐两个时期;唐(朝)中期则相当于四分法中的中唐时期;而中唐与晚唐的分界线,则以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作为标志。这一事件是晚唐一次特殊的宫廷政变,是一场由李训、郑注暗中策划,企图尽诛宦官,最后弄巧成拙、事与愿违的冒险行动。然而这一历史悲剧使得自中唐以来就较为平稳的政治局势发生剧烈的变化,并急剧向着晚唐转变,进而影响了唐代历史的发展走向。盖因“甘露之变”以前,唐朝的国势依然受惠于中唐“元和中兴”以来之余绪,统治集团中的那种积极入世、求治进取的革新精神尚未完全熄灭,整个社会还是表现出平稳发展的势头。而事变之后,唐朝开始步入晚年的多事之秋,政局渐趋晦暗莫测,宦官专权的渐趋恶化,阶级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唐代继安史之乱后又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在学术界也获得了众多的认可。

^① 上述关于唐史分期的概括参见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之序言部分,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三 问题之提出

唐代文宗、武宗两朝，特别是文宗一朝，作为由中唐向晚唐演变的过渡期与转型期，是唐代后期政治斗争最为激烈、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形势最为多变的一个阶段。

发生在唐文宗大和末年的“甘露之变”，是中晚唐之交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由翰林学士发动的、旨在全部消灭当时颇具权势的在朝宦官集团的一场流血未遂政变。政变的结果是翰林学士势力失败被杀，还因此祸及外朝宰相等官员，一度造成了宦官专权独大的局面，并由此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社会面貌造成强烈冲击，特别是国家体制、政治格局以及社会心理、士大夫行为方式等方面。通过认真比较后可以发现，在“甘露之变”发生的前前后后，整个唐朝中枢政治格局与社会面貌都呈现出了很大的不同。正如学界把对唐代的社会面貌带来巨大震撼的“安史之乱”定为盛唐与中唐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线一样，“甘露之变”对当时和此后的影响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唐朝开始踏入晚唐时期的转折处和关捩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将“甘露之变”定性为中唐与晚唐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线也是恰如其分的。

具体而论，唐代文宗、武宗两朝的中枢政局在整个唐代政治史上恰好处于带有某种转折性质的关键时期。从宝历二年的“宝历宫变”开始，一连串对晚唐时代的中枢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相继发生——文宗之继统、刘蕡试策案、宋申锡冤案、拒纳维州事件、格局改革的反覆、一度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纠缠多年的牛李党争、储位废立风波、武宗的继位、仇士良等

宦官的专权跋扈、李德裕之独相及其揽政、限制宦官权力、平定昭义之乱等。所有的这些政治事件几乎都与当时的中枢政治体制有着或深或浅的干系，同时又对这一时期的中枢政局造成相当的影响或冲击，只不过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而这一时期的中枢政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宰臣、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中尉，个别时期还包括藩镇在内，能够对政治中枢产生较深影响的这几大政治势力之间，在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争夺的同时，基本上能够维持着一种势均力敌、彼此约束的制衡状态。这样一种权力状态的存在，使得唐王朝的行政体系能够保持整体上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得唐王朝的统治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处于政治中枢核心地位的皇权则在这几大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特别是对与皇权产生较大矛盾的宦官、宰臣，甚至还有藩镇势力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其间既有重大失误，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可谓得失互见。与此同时，文、武两朝的中枢政局也对晚唐政治模式的确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其中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宦官策立嗣君制为基础，奠定了在皇权承传上“内大臣定立，外大臣即北面事之”的政治惯例；二是在中枢“内外共议”体制下，“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政治局面得以合法化。上述两者则共同构成了支撑晚唐政局的两大基石。

如果我们把“甘露之变”看作一个时间界标，再往前和往后稍作推移，则恰好可以囊括唐文宗、武宗这两朝的历史。这段历史时期作为中唐向晚唐的过渡，带有很浓厚的时代色彩。因此，如果能够对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的中枢政局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探讨围绕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众多历史事件与历